

贝原益轩和《大学》

(日)辻本雅史

(台湾大学日文系,台湾)

摘要:贝原益轩(1630~1714)传世作品很多,经书注释书却极少。唯独对作为“初学入德之门”的《大学(章句)》,针对初学者撰写了注释书《大学新疏》,且为其出版做了诸多努力。益轩摘录的均为元明注疏本,对日本著作并未摘录。换言之,益轩在东亚“明代四书学”的知识空间中受容了朱子学。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然因缺乏需要,益轩断绝了出版《大学新疏》的想法。之后,益轩致力于出版以平易的和语写作的儒学启蒙书,且笔耕不辍。益轩转向的背景是商业出版媒体的登场以及阅读和语知识书籍的民众读者层的形成。通过活用商业出版这种新的传播媒体,益轩在新的“理知风景”^①的形成中担任了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

关键词:贝原益轩;出版媒体;商业出版;理知读书;《大学新疏》;益轩十训

中图分类号:B 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6)02-0017-07

一、引言

贝原益轩是日本江户前期的朱子学者。与其仅仅说益轩是一名日本江户时代的、通过再构建朱子学而展开论述的儒者,倒不如说他是一名立足于日本社会接受朱子学,且将其学问向民众开放的儒者更显恰当。益轩共留下了计“百五种”,达数百卷的庞大著作群。其种类也是史无前例的多样,如儒学、地志、纪行、本草、养生、启蒙教训、辞书、事典、礼书等,几乎涉及了所有领域。可以说,儒者益轩没有论述过的体裁或主题是不存在的。在此意义上,益轩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儒家知识分子。

迄今,益轩受到了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和解读。在儒学史上,凭借批判朱子学“理”的概念的最晚年著作——《大疑录》,益轩被认为是解体朱子学、开辟古学派形成之道的“古学先驱者”。这一观点也基本上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在自然科学领域,益轩据《本草纲目》,搜罗万物而著述了日本本草书——《大和本草》,所以又被关注自然哲学的科学史家评价为

诞生于日本传统中的“自然科学者先驱”。学者们把益轩视为“实学者”的观点大抵如此。此外,在教育领域,益轩所著《和俗童子训》也是关于儿童教育的最初的有体系论述。因此基于“近代”基准,益轩又被评价为“本邦教育学之祖”。还有非常痴迷于益轩名著《养生训》的人,他们高度评价益轩养生法的医学合理性,视其为近代性合理主义者。

迄今,益轩研究均是研究者从趋向专门化、精细化的现代各学问的立场出发,以对各自领域的关心而展开的论述。这固然多少可以弄清楚益轩思想的某个方面,但即使把这些方面汇总起来,也不能弄明白儒者益轩的思想全貌和特质。益轩著作中“理知特质”的形成原因,依然不甚明了。

聚焦于益轩的研究,多是从单一的近代学问的研究视域出发,出发点依然停滞在当今的学问视角。研究成果也不过是沿着精细化的现代学问的构造,对益轩学问的某个侧面横切之后的分析说明。被强行分离的、切合于现代学问构造的这些横断面,也只是些从益轩所处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文脉中被抽取展

收稿日期:2015-12-06

作者简介:辻本雅史,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台湾大学教授,从事日本教育史、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

出的内容而已。

从当今学问视角进行“近代始源”的探索是无法认清益轩的历史意义的,因此研究益轩的视线必须发生“反转”。研究者有必要把益轩重新放回近世“理知现场”及“文化历史空间”,对益轩的学问意义进行再研究。

“益轩十训”^②在益轩逝世后一再重版,甚至一直广泛影响到近代。应该如何看待此事实呢?要想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不仅著作内容,而且出版媒体以及读者层问题也很有必要纳入研究视野。

与此相关,迄今的思想史研究,多是致力于在著作内部进行思想重构。而实际上,思想著作的生成受到周围诸状况的制约和影响很大,如信息流通状态、著作公开刊行意愿的有无、而且出版文化状况以及目标读者群等,存在很多因素。这要求思想史研究不能只包括叙述内容,扩展至文本之外的、使此文本成为可能的文化和思想空间也要纳入研究视野。

二、益轩的注解工作

在益轩庞大的著作群中,经书注释书所占比重很小。而山崎暗斋、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同时代的儒者,在对四书等其他经书的解释和注释工作中,通过与前人的思想展开格斗,建构了自己的学问。关于成果,仁斋著有《论语古义》和《孟子古义》,徂徕著有注释书《论语征》等,暗斋则选择了一条忠实于朱子注释的祖述之路。

与他们相比,想要举出能够与以上经书注释相匹敌的益轩著作是很难的。其中,受到关注的益轩注解书有1668年的《近思录备考》14卷和翌年完成的《小学句读备考》6卷。在益轩的著作年谱中,两书均属于很早期的著作。益轩通过对以往的关于《近思录》和《小学》的先行注释书取舍选择,再加上自己的论评而完成了两书。尽管两书都出版普及,但是和仁斋、徂徕所著的经书注释书相比,则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首先,《近思录》和《小学》均为初学朱子学的入门书籍,而非经书。正如益轩在《小学句读备考》跋中所述,“予曩游于京师,与诸生讲此书。因训诂之难解、旁搜传记而摭有资于讲说者为编、以备他日之参考”^③。作为入门书的详细注释文本,它是《小学》的一种参考书、学习书,并不是益轩直面经书原典,参照先学的诸种注释而注解的自身体悟。对他而言,学问规范的体系(朱子学)是无需赘言的当然之理,这本书也不过是益轩针对有志于正确学习《小学》的初

学者而著述的启蒙读物。换言之,是教育的动机促成了此文本的编纂。在当时的教育活动中,益轩找到了自身的作用和价值。

在《近思录备考》刊行(1668)的同一年,益轩编写了《朱子文范》。关于编纂缘由,《益轩先生年谱》有如下记载:“此顷信朱文公之学术愈笃,好读其文集。乃穷乡晚出,为不能阅其全集之人,纂辑精要而为五卷,使久野正的加训点,自补正之以行世。是为朱子文范也”。即《朱子文范》是益轩精心选择朱子文集集中的要点,针对地处偏远甚至连与朱子相关的书籍都不曾得见的人而编纂的。这种编纂态度,也一直贯彻于他在学习用文本的编写中。

虽然益轩没有倾心于经书注释,但唯独对《大学》抱有强烈的关心。为推进《大学》的注解工作和出版发行,益轩做了不懈的努力。之所以益轩对《大学》的注释和出版抱有如此强烈的关心,是因为《大学》不但是说明“初学入德之门”、“为学次第”(《大学章句》经文序章所引程子语)的书籍,而且是说明学问目的、顺序以及方法的初学者必读书籍。如益轩所述,“大学之书所载规模节目之次第即是圣学之模范,古人为学之法也。由是而学焉则可为正学而不差于圣人之教矣”^④。益轩并没有脱离朱子学者的惯例,也认为《大学》是四书中应该首先学习的经书^⑤(P3)。继完成《小学句读备考》和《近思录备考》之后,到《大学》注解学习书的编纂,其脉络是一贯的。

三、《大学集要》的编纂

益轩对《大学》的注释或说是注释编纂的具体工作,可以确认的有三项:一是《大学集要》的编纂;二是《大学新疏》的完成和出版努力;三是《大学说》的著述。笔者想首先阐明的是《大学集要》编纂作业的相关事实。史料依据是益轩写给竹田春庵的益轩书简,收录于《益轩资料四、五》^⑥中。其中,春庵是益轩学问上的弟子,担当益轩编纂作业的助手工作。作为福冈藩儒的益轩,其学问亦被春庵继承,春庵子孙亦世代效力于福冈藩。

据益轩书简,在1670~1680年间,益轩对南宋至明的《大学章句》相关注释书(或疏释书)进行筛选,致力于注疏本《大学集要》的编纂工作。他从元明的《大学章句》诸注疏本中,择其益处,命春庵摘录,并把摘录的要领写成笔记来指导春庵^⑦(P78-80)。益轩摘录的著名文本(大半为注疏本)有:《朱子语类》、《章图》、《大全》、《蒙引》、《存疑》、《浅说》、《讲述》、

《翼注》、《大学启发集》十本。益轩计划把摘录的注释插入到《大学章句》的经、传和章句的文本中,编写《大学集要》。此书本来不过是益轩编纂《大学》注疏本的选录之作,然而从“愚见别录、虽知谬妄如何、然俗之难晓处仅依古人之说而不备,而间间出臆说矣”^[9](P79)所述可见,在《大学集要》中,益轩在汇集各注释本之注解的同时,也插入了自身的解释。

事实上,在益轩所阅读的宋乃至明的书籍中,上述注疏本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益轩的肯定。以下,笔者试对各文本一一分析确认:

《朱子语类》。无需赘言,此书与《大学或问》同样,均为解释《大学章句》的必读书。

《章图》。因其他书简中存在有“辑释章图之事”之记录,可知此书即《四书辑释》(即《四书辑释章图通义大成》,1342年刊),为元代倪士毅(1252-1334)根据其师陈栎所著《四书发明》而作。陈对自己籍贯休宁(江西省)而与朱子同乡一事,很是自豪。科举失败后,陈提倡结合科举课程来通晓“一经四书”,他站在视《朱子章句》为“经书”的神圣无缪立场,著述了《四书发明》。后来,同乡弟子倪又根据《四书发明》,广泛采纳胡炳文的《四书通》,著述了《四书辑释》。《四书辑释》后经改订充实,为《重订四书辑释》二十卷。上述注释集均采取了忠实于朱子学的立场,且为明《四书大全》之底本,在四书注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全》,即《四书大全》。此书因明朝永乐帝在1414年所发敕命而开始编纂,与《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一并于翌年完成。《四书大全》基本上以倪的《四书辑释》为底本,采纳吴真子的《四书集成》,又补拾了南宋至元所疏漏的注释,为宋元两代四书学的集大成者。这些书对于科举基准文本的确定,存在重要意义^[9](P250)。

此外,益轩还比较《四书大全》和《四书辑释》,认为《辑释》中存在很多《大全》所没有采录的“嘉言”。据此,益轩认为《章图(辑释)》较《大全》好,高度评价倪的《四书辑释》。而且,对于《大全》,益轩认为其“小注繁缛支离而不切且不是者多矣、程朱南轩真西山之外可采用者少矣”^[9](P16),即除程朱、张南轩(与朱子同时代)、真西山(宋末)等所著之文本外并无可堪引用者,对《大全》的评价并不高。

《蒙引》,《存疑》,《浅说》。此三部均是作为适应科举应试的学习书而问世的。它们均为从忠实于朱子学的立场出发的,经过部分修正而流传的明代注疏本。《四书蒙引》(1504年顷)作者为蔡清(虚斋);《四书存疑》(1523年原序)为林希原;《四书浅说》

(16世纪半成立)为陈琛(紫峰)。如“《四书蒙引》乃朱注之孝子、《存疑》乃《蒙引》之忠臣、《浅说》为集成”^[9](P254)所述,作为明代科举之学,以上注释书排斥当时流行的阳明学系解释,采取拥护正统朱子学的立场。这些基于朱子学的、作为明代科举依据标准的注释书,得到官方的高度评价。尤其《蒙引》在清代屡被征引,为公认的标准注释文本。如“(《蒙引》、《存疑》、《浅说》三书)以朱子为宗初学之徒不能理会于朱注者须以此等说为阶梯”^[9](P17)所述,益轩对作为朱子学初学者理解朱子集注的这三部学习书,给予了很高评价。

《(四书)讲述》为明代庐一诚、《(四书)翼注》为明代王纳谏所著。益轩认为,前者虽逊于《蒙引》、《存疑》,然训诂颇值一阅;后者虽有和朱子本注不一致处,但于“义理发明”方面亦有可取之地^[9](P17)。对张居正的《四书直解》,益轩认为其很通俗,利于“王公观听”。此外,明儒注释书虽仍有很多,但益轩断定其并无可堪阅者。关于明代隆盛的陆王之学(阳明学),益轩认为其“以儒释混同为一道”,斥其为“阳儒阴佛”之“邪说”^[9](P30)。通过这些以明代科举之学为前提而编纂的标准注释文本,可以明白益轩吸收朱子学的实况。

《大学启蒙集》为日本朱子学者山崎暗斋于1669年所著。据益轩读书录《玩古目录》,益轩在1679年(《大学集要》处于编纂工作中)确实读过这本书。不过,益轩并不认为此书有可用之处。虽然这本书被加进了引用列表,但可以看到存在后来涂抹的痕迹。而且,被推定为是益轩晚年所著的《大学说》(慎思录·卷七)中也没有引用此书。益轩虽然注意到了暗斋朱子学,但其并不赞同暗斋朱子学。如下所述,相较于暗斋主理派系的朱子学,益轩属于主气派系,二者在思想上是异质的。

四、注疏本出版的受挫和益轩写作方向的转变

据益轩书简,《大学集要》的编纂工作始于1679年秋。按《大学章句》之序文、经文、传文、句读(后为3卷本,此句读可分为上、中、下卷)的次序,编纂工作高效地推进着。付印用的刻木版草稿的抄写好像由一个名“勘六”的善书者负责。1680年2月末,益轩因为公事,携着抄写的原稿去了京都。带着《大学集要》原稿,益轩与出版书肆进行了面对面的商谈,不过最终结果不太顺利,没能出版。

益轩并没有放弃。18年后(1698年),69岁的益轩带着妻子去了京都,并滞留到第二年。这次旅行成了益轩的最后一次京都之旅。乘着这个机会,益轩携《大学新疏》原稿(抄写本),多次奔走于京都和大阪的出版书肆,为求付梓百折不挠。关于其原委,在益轩所遗书简中有叙述。从书名可知,此《大学新疏》原稿无疑是上述益轩同春庵摘录注疏本而作成的《大学集要》完成稿或以此为基础修正而成的稿本。虽然之前《大学集要》(1680年时正处于编纂中)出版失败,益轩并没有放弃,后重新改订,再更名为《大学新疏》,等待出版时机。《益轩先生年谱》中1684年的“此岁成《大学新疏》”条记事,证明了这一事实。

据1698年书简记载,《大学新疏》成功出版之后,益轩又计划着手编辑《中庸新疏》。不单是《大学章句》注疏本,益轩一直就有逐次编纂出版《四书集注》注疏本的打算。益轩的目的是为儒学(朱子学)学习者提供可用的参考书。想来,为日本的朱子学学习者编纂一套可以与中国的《四书大全》相媲美的四书注释(注疏)定本(日本无科举,故为较《大全》简略的标准文本),一直就是益轩的志向。

关于当时益轩在京都和大阪书肆的交涉详委,笔者在此略过。不过,没有益轩的努力,《大学新疏》在当时是不可能出版成功的。其主要原因可以说是出版书肆出于营利性判断的结果。即从营利的角度来看,益轩注疏本的出版被认定是入不敷出的¹⁷。

诚然,即使是通过摘录宋代乃至明代的朱子学的烦琐注疏而作成的、四书中首先当学的《大学》的儒学注释文本,在当时的日本也是无法期待有能够满足成本的读者群的。书肆的上述判断并没有错误。《近思录备考》和《小学句读考》的出版,益轩居功至伟,而且两书也得到了广泛的阅读。《近思录》和《小学》是朱子学初学者的必读书,却并不易读。加上由于日本当时还没有两书的注释书,所以益轩的《近思录备考》和《小学句读考》的出版还是有一定市场需求的。而与之相比,经书《大学》的注释书已经有朱子的《章句》和《或问》了。对于当时求学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有这两本书(再多包含《近思录备考》《小学句读备考》)已经足够用了(除了极少一部分以专业儒学者为目标的学生外)。宋乃至明的注释书较朱子的《章句》更加繁琐,所以其必要性不被认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8世纪初叶是一个藩校存在尚属特例的时代。到藩校普及、武士向学,还需要一个世纪的时日。当时儒学在武士层的普及仅限极少数上层武士,多数

武士还没有学习儒学的习惯。1699年,益轩察觉到要想成功出版经过多年努力而编纂的四书注疏本是极困难的。这也让他认识到了其此前学问活动的局限性。以此年为界,益轩断绝了写作汉语经书注释类著作的想法和出版念头。之后,直至益轩85岁逝世,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埋头于和文教训书的执笔和出版工作(《自娱集》、《慎思录》等汉文著作除外)。以切合当时文化出版需要(读者需要)的形式,他找到了活用自己学问的方向。

在书写具有识字能力的普通庶民就能够容易理解的简单教训著作以及于日常有用的启蒙著作时,益轩找到了自己的意义价值,即把依据汉文这种“知的语言”而存在的儒学,翻译成普通庶民也能够理解的媒体媒介(通俗语言)进行传播。换言之,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日本社会中,能够通过阅读益轩著作来理解学问(儒学)的学习者已经广泛出现了。在1700年前后的元禄时期,至少在城市地区,通过习字塾获得识字能力的庶民已经占多数,文字已经浸润到了社会生活中(即“文字社会”)。顺应识字民众的需要,益轩将儒学著作翻译成平易的通俗语言,并在内容上对其进行改变以适应日本社会,写作和出版了大量民众教训书及实用书籍。

五、东亚儒学的外围

益轩所著《大学说》收载于《慎思录》卷七。至益轩去世(1714),《慎思录》出版发行到了第六卷。第七卷至第十二卷此后一直没有刊行,现以草稿的形式保存于福冈竹田家中。关于《大学说》的著作年代并不清楚,不过从《慎思录》卷六的刊行时期来看,当属益轩临近晚年时期的著作。

和上述《大学集要》、《大学新疏》同样,注释书《大学说》并不是据先行注释书而对《大学(章句)》逐字逐句的注释。与《大学》内容相关的益轩解释,《大学说》中涉及有94条汉文记述,其总计34页,半页18字×10行,经竹田春庵之手抄写而成。与《慎思录》卷七、卷八所收录并言及其他诸经的内容相比,言及《大学》的字数特别多。其中,《论语》20页,《孟子》5页,《中庸》、《书经说》、《易说》各7页,《礼记说》5页,《孝经》计6页。《大学》正文最短,着墨却是最多。对《大学》,益轩抱有极大的兴趣。

《大学说》中多次提及并参照了益轩之前编纂《大学集要》时所摘录的注疏文本。关于其次数,有《四书辑释》(《四书辑释章图通义大成》,倪士毅)1

次;《四书大全》(明)1次;《四书蒙引》(明·蔡清)8次;《四书存疑》(明·林希元)4次;《四书浅说》(明·陈紫峰)4次;《便蒙讲述》(明·庐一诚)7次;《四书翼注》(明·王观涛)3次;《大学启发集》(日本·山崎暗斋)没有提及。

除此之外,关于中国儒者的名字(包含朝鲜朱子学者),提到的有宋濂(明,《四书释蒙》)、方孝孺(明,《方氏浅解》)、李退溪(朝鲜)、东阳许氏(白云,明)、新安陈氏(里,明,《四书发明》)、邵子(雍、康节·北宋,精通易学)、郑玄(后汉,《古注》)、孔氏(颖达,初唐,《五经正义》)、司马温公(光,北宋,《资治通鉴》)、王阳明(明)、杨慈湖(简,南宋)、吕东莱(祖谦,南宋)、杨升庵(慎,明)、罗整庵(明,《困知记》)、真西山(德秀,南宋,《大学衍义》)、张师曾(元)、金仁山、饶氏(双峰)、胡云峰、陈北溪(淳,南宋,《性理字义》)等。

总之,益轩广泛涉猎了中国舶来的宋乃至明代的朱子学者的书籍。从这里或可管窥益轩朱子学理解形成的一端。由于锁国政策,日本通过长崎与东亚及欧洲密切联系,所以来自中国、朝鲜等地的很多舶载书籍都被运送到了长崎。作为福冈藩儒,益轩担任着福冈藩收购长崎舶载书的书目选定工作。当然,益轩对大陆的学术信息也很感兴趣,他经常和经营舶载书籍的书贩进行交流,舶载书目录也经常被运送至他的手中^[9](P191)。依此,益轩得到了阅读中转到长崎的中国儒学书籍的机会。因此,益轩学问的形成并没有依托日本儒者的著作(日本儒者的著作出版的尚很少),而是依托自中国舶来的书籍。只要翻阅益轩的读书录——《顽古目录》,即可明白这些情况。

通过对以中国的宋元明科举为前提的朱子学注疏类儒学书籍的学习,益轩形成了自己的朱子学理解。笔者认为,把益轩的儒学放置在同时代的中国朱子学的外围的位置进行考察或许更为恰当。迄今为止的日本儒学思想史研究,也一直桎梏于日本儒学史内部,因此益轩被贴上了“古学派先驱”、“经验的合理主义”的标签。笔者认为,这种研究史必须予以修正,而从东亚儒学史的视野来研究益轩的观点也很早就已经被中国思想研究者阿部吉雄、荒木见悟、冈田武彦等提起过^[9](P10113)。

益轩受到了中国何种儒学(朱子学)的影响呢?这就必须结合明末儒学史的动向来进行探究。关于这一问题,有观点认为益轩受到了隶属于明代朱子学“主气派”的罗整庵(著《困知记》)的影响^[10](P471-475)。诚然,正如在益轩最晚年的著作《大疑录》中所表明的那样,益轩对朱子“理”的深深怀疑很明显是

以“气”为根本而形成的^{[11][12]}。

另一方面,和益轩处于同时代的山崎暗斋,则受容了与明代主气派相对照的主理派朱子学。受主张寻求理之“体认自得”、重视“居敬”的明儒薛敬轩和朝鲜主理派李退溪的影响,暗斋主张以“居敬”为本和理之实践的“体认自得”的方法。

通过批判以科举为前提的元明朱子学的注疏文本,暗斋提出了自己的学问。在这一点上,暗斋和益轩站在了相对立的位置。其中,暗斋对《四书大全》的批判尤为猛烈。此外,他还对益轩一再征引的蔡清的《蒙引》、林氏的《存疑》、陈氏的《浅说》大加批判,指出这些书籍虽然均以准确理解朱子集注为目标,但都是背道而驰的错误解释。他认为这些书都是元明朱子学的“末疏之书”,而且正是这些“末疏之书”妨碍了对朱子学的正确“体认”。他毫不留情地对元明“末疏之书”大加排斥,主张直接师从朱子原著。

除了暗斋这个特例,17世纪日本儒学者对朱子学的态度大多都根据《大全》之类的元明集成注释书,这从益轩之学即可明白。服务于幕府的朱子学者林罗山,也涉猎《大全》这种以科举为目的的元明注疏本,并据此讲授朱子学^[9](P306-307)。而暗斋排斥当时日本儒学(甚至中国明末朱子学)的这种态度,对抗性地确立了自己的学问。

暗斋排斥元明注疏本,积极学习朱子原著,致力于通过自我体验来把握朱子学的“理”。他认识到朱子所言之“理”,即是自身“体认自得”的对象。为此,就必须首先要对朱子原著的文本(定本)确定下工夫。关于四书的定本,他认为《大学》为《章句》、《或问》、《序跋》;《中庸》为《章句》、《或问》、《辑略》、《序跋》;《论语》和《孟子》各有《集注》、《读法》、《序说》。这些都是暗斋基于朱子之《文集》或《语类》等细致全面的研究而提出的观点。

如上所述,包括暗斋研究在内,研究者必须要从东亚儒学外围的视点来把握17~18世纪的日本儒学。即使是对被认为提出独创性的日本儒学的荻生徂徕,笔者也希望研究者能认识到其思想也是邂逅王世贞、李攀龙所言的古文辞学后才形成的。

六、《大学说》的特征

在《大学说》中,益轩是如何阐释“大学”的呢?以下笔者就其若干特征予以示例说明。

正如益轩所述“程朱之说恐可为当”或“朱子之说极精确明备”,他基本上沿用了程朱之说。不过,益

轩并没有简单地祖述朱子之说,而是部分性地提出了自己的学说。

如关于“明德”是“心”抑或是“性”的论争。朱子在《章句》中把“明德”定义为“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大体上把“明德”和“性”=“本然之性”等置起来。益轩则根据张载“心统性情”之言,将“心”、“性”、“情”之间的关系予以公式化。除朱子的《集注》、《语类》之外,益轩还征引邵康节著作《存疑》和《浅说》等,最终把“明德”定义为“明德是人之本心,兼性而在其中,非专指性言,又非专指知觉而说”,与朱子的定义并不相同。在益轩这里,“心”被理解成了“知觉之名、精神之所在”。如“苟有心而不存众理不可谓本心、只是知觉而已、不可为德”之言,“明德”被认为是具有“知觉”机能的“心”具备“众理”(“仁义礼智”之德)的状态。益轩之所以主张这种个人的“明德”说,是出于与佛教对抗的缘故。仅仅以“心者身之所主”(大学章句)之言,和佛教是没有区别的。相对于“佛氏偏主心而舍四德以弄精神为工夫”,儒者还应具备“众理(仁义礼智之德)”。而且,益轩还认为“心譬如谷种,种之生意即是性、有生意而可谓之种子”,把心比喻为种子。生意(性=仁义礼智)具备之后,心就可以成为“本心”。益轩的明德说,即“明德”为“心之本心”。

此外,再比如关于“亲当作新”之说,益轩虽然在结果上支持朱子之说,但其根据和朱子并不相同。此外,益轩还反对朱子的“物犹事也”之说。他把“物”限定为“有形象谓”,把“事”限定为人的行为事项,以区别二者。以下笔者就益轩之“格物”作一探讨,试考察益轩儒学特质之一端。

在《大学说》中,益轩完全没有提及朱子穷理说的核心——“格物补传”。这反映出益轩在明末朱子学中,面向科举的注释书除外,已经对朱子的《格物补传》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益轩并没有仅仅依据官撰的注疏本(即暗斋所言“未疏之书”)。

益轩简单追溯了“格物”说的变迁,批评其他说法,认为其“皆与程朱之说龃龉”。他尤其指出“诸儒之训格物多就行之一边说了,于致知之工夫不相干涉”,“遗弃事物而求致知”,批判其有悖“以知为先”的圣贤之教。他从重视切合具体事物的、“致知之工夫”的主知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明代诸儒之说,主张根据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来把握《大学》。他支持朱子穷理之说,认为“程朱即物穷理之说最著实明备有下手工夫”,并评价其为“试之日用事物应接之际

而为有验、求之天理当然之则而为不悖。”

然而,关于朱子学的“理”,益轩对“所以然之故”是存疑的^[21]。益轩把理专门理解为“所当然之则”的意思^③。益轩的格物穷理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呢?首先,重视“博学”,即“格物之功须先求于身心而后博及于事物”。确实,益轩不仅有治心的《大和俗训》类的道德书、修身的《养生训》以及《颐生辑要》等“身心”之书,还著述了探求物(事物)之性质的本草书。在《大学说》中,益轩认为“(程子言)一草一木皆有理宜察之(正为须是察)者、其说虽似泛滥、然天下之事无不有理、穷之不博则其应事也不当”,并举出具体的例子来描绘其意图。“譬如种植于草木然。培养乖其性则枯矣、然则当种植之时、虽一草一木微细事亦适为当务之急、是格物之所以贵博也”,揭示在农作物栽培中探究一木一草固有性质(理)的实际价值,并将其置于“格物穷理”之学的一环。在《大和本草》的序文中记述,也有“物理之学”的书目,这意味着益轩已经认识到详述万物性质的本草书实际上就是“穷理之书”。

益轩非常重视穷理。然而,在另一方面,关于朱子在《大学或问》中不断强调的、与穷理并列的为学方法——“居敬”,益轩并没有单独提及,而是把“敬”放置在与“诚”的关系中来进行把握。“盖诚敬二者、固是为学之要务、然诚是为主本、敬是为工夫、故主忠信者本也、是为学之注意、居敬者主忠信之工夫也。不可为主本、主本与工夫自有轻重、不可混同”(论敬·大疑录)，“居敬”被当做是为“诚”的工夫(方法),与朱子所认识的“居敬”的地位毫无可比性,为益轩所轻视。相较于“穷理”,山崎暗斋则更加重视“居敬”。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对照的。

此外,《大学说》中也含有围绕“未发、已发论”、“正心”等富有深意的论述。而且,益轩也没有提及朱子学的“人性”说(朱子学的“本人—气质”说)。毋庸赘言,以上均为益轩思想特质的反映。对于这些主题的详细探究,必须根据益轩的其他思想著作,紧紧联系益轩思想特质,进行再研究。

(王起 译)

注:

- ① 原文为“知的风景”,指前文中由于民众读者层的形成,出现了读书、探究学问的现象。下文有关“知的”均译为“理知”。
- ② 益轩所著的、以识字民众可以自如读解的平易语言而写就的教训书和通俗书之类的总称。

③ 从此立场上来讲, 益轩无视以“一旦豁然贯通”之“所以然之故”的理为目标的《格物补传》也是理所应当的。

参考文献:

- [1] 益轩会编. 益轩全集(卷2)[M]. 东京: 国书刊行会, 1910.624.
 [2] 井上忠编. 大学说[A]. 贝原益轩资料集(上)[M]. 东京: 东京ペリカン社, 1989.40.
 [3] 井上忠编. 读经总论[A]. 贝原益轩资料集(上)[M]. 东京: 东京ペリカン社, 1989.
 [4] 井上忠校订. 益轩史料[M]. 九州: 九州史料刊行会, 1955-1961.
 [5] 井上忠编. 书简·益轩资料卷四[A]. 贝原益轩资料集[M]. 东京: 东京ペリカン社, 189.
 [6] 佐野公治. 四书学史の研究[M]. 东京: 创文社, 1988.
 [7] 辻本雅史. 贝原益轩と出版メディア[A]. 近世日本思想史

- 研究の现在[M]. 东京: 思文阁, 1995.101.
 [8] 井上忠. 贝原益轩[M]. 东京: 吉川弘文馆, 1963.191.
 [9] 阿部吉雄. 日本朱子学と朝鲜[M].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65.
 [10] 荒木见悟. 贝原益轩の思想[A]. 日本思想大系三四[M]. 东京: 岩波书店, 1970.
 [11] 辻本雅史. 近世における「气」の思想史·觉书[A]; 学术の成立[A]. 思想と教育のメディア史—近世日本の知の伝達[M]. 东京: ペリカン社, 2011.
 [12] 横山俊夫编. 贝原益轩—天地和乐の文明学[M]. 东京: 平凡社, 1995.
 [13] 冈田武彦. 江戸时期の儒学[M]. 东京: 木耳社, 1982.

【责任编辑: 来小乔】

Ekiken Kaibara and *Da Xue*

Tujimoto masasi

(Japanese Department,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China)

Abstract: Ekiken Kaibara (1630–1714) left behind many works, but among which scripture commentaries are extremely rare. He wrote only *Da Xue Xin Shu* (*New Annotations for Da Xue*) for beginners learning *Da Xue* (*Zhang Ju*), a basic work for moral enlightenment, and made great efforts to make it published. The commentaries extracted by Ekiken all come from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rather than Japan. In other words, Ekiken accepted Zhu Xi's philosophy in the intellectual space of “Four Books of Ming Dynasty” in East Asia. Although working hard, he gave up the idea of publishing *Da Xue Xin Shu* due to inadequate demands. Later, Ekiken turned to publishing enlightenment books of Confucianism in vernacular Japanese, and kept writing. The reason for this change lies in the appearance of commercial publication media and the audience of informative books. Ekiken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wisdom sphere” by utilizing the new media called the commercial publication.

Key words: Ekiken kaibara; publication media; commercial publication; intellectual reading; *Da Xue Xin Shu* (*New Annotations for Da Xue*); Yixuanshixun